

罗马史

第五卷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商務印書館

014061189

K126
07
V5 2014

罗马史

第五卷

[德]特奥多尔·蒙森

李稼年 译



k 126
07
v5
2014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北航

C1748285



北航

C17482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史. 第5卷/(德)蒙森著;李稼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08974-6

I. ①罗… II. ①蒙…②李… III. ①古罗马—历史
IV.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323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罗 马 史

第 五 卷

〔德〕特奥多尔·蒙森

李稼年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974-6

2014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定价: 42.00 元

031130310

Theodor 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
(History of Rome)

Band V

(J. M. Dent and Sons Ltd, 1920)

根据慕尼黑德意志袖珍书籍出版公司 1984 年德文版翻译,校订时参考了
伦敦 J. M. 登特父子有限公司 1920 年英译本



第 11 卷 第 1 册

1982 年 11 月

目 录

第五卷 军人君主制的创立

第一章	马尔库斯·雷比达与昆图斯·塞尔托里乌斯·····	2
第二章	苏拉的复古政治·····	32
第三章	寡头党的倾覆和庞培主政·····	78
第四章	庞培与东方·····	99
第五章	庞培出外时期的党争·····	136
第六章	庞培的隐退和争权者的联合·····	163
第七章	平定西方·····	181
第八章	庞培和恺撒的共治·····	253
第九章	克拉苏的死 共治者的决裂·····	284
第十章	布隆迪西乌姆、伊莱尔达、法萨卢斯和塔普苏斯·····	313
第十一章	旧共和与新君政·····	388
第十二章	宗教、教育、文学和艺术·····	481

第五卷 军人君主制的创立

他这样四方顾盼，

这事却在他的脑里作乱，

对这些事他想说什么？

他如何联结这些洪波巨浪？

他怎样一直保持旺盛精力，

立即歌唱和描述？

——歌德

第一章 马尔库斯·雷比达与 昆图斯·塞尔托里乌斯

苏拉死于 676 年即前 78 年，那时他所恢复的寡头政府正以无限的权力统治罗马国家；不过这个政府既赖武力而成立，仍需用武力始能对秘密和公开的众多敌人维持其地位。它的敌人不是有表明的宗旨和隶于认定的首领之下的一个单纯党派，而是成分极为庞杂的一群人；虽然合起来通称为平民党，但实际上他们却以迥不相同的原因和大相径庭的用意，来反对苏拉的共和组织。其中有成文法家，他们既不从事政治，也不了解政治，但据他们看，苏拉任意处置公民的生命财产是个暴行。当苏拉尚存之时，一切别的反对党都噤若寒蝉，严肃的法学家已起而反抗摄政，例如科尔涅利乌斯法剥夺各意大利民社的罗马公民权，在司法判决中都被视为无效；一个公民在革命期间成为战俘而被卖作奴隶，法庭也认为他未丧失公民权。再者，旧日元老院少数派的开明分子仍有存者，他们以前力谋与改革派和意大利人成立妥协，现在以同一精神愿对平民党让步，缓和苏拉那种僵硬的寡头体制。更有进者，所谓狭义平民党的那真诚笃信而褊浅的激烈分子，为党纲的流行口号而牺牲生命财产的，在胜利以后，只见他们所奋斗以求的不是实事而是空言，痛感惊异。他们特殊的目的是恢复保民官的权力。苏拉固然没有取消保民官的权力，却夺去其最重要的特权；因为这种制度没有具体的实用，实际不过是一个空幻的幽灵，所以对于大众更能发挥神秘的魔力——一千余年后，只是保民官这个名目就能使罗马发生极大的变化。尤为重要的，几个人多势大的阶级未因苏拉复

古而得到满足，他们的政治利益和私人利益反而遭到侵害，因此他们属于反对党。其中有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富庶区的人民，他们当然认为 665 年即前 89 年的授予拉丁权仅为得有十足罗马公民权的初步，于是易于酿成骚乱。属于此类的又有脱籍人，因其数目众多，资财雄厚而有势力；又因他们聚居首都而特为可畏，复古以后他们回到旧日实际无用的表决权地位，他们不能忍受。又有大资本家也处于这个地位，他们谨守缄默，但始终保持其牢不可破的怨恨和一样牢不可破的势力。首都的群众认为白送粮食便是真正自由，也不满意。一班受苏拉没收财产之害的公民更深感愤慨——有如庞培人，财产被苏拉的殖民团所侵削，却与他们共居一座城墙之内，无日不与他们互相争执；或有如阿雷提纳人和沃拉帖雷人，实际仍保其领土的所有权，但常受罗马人的威胁，其领土有被没收之虞；特别如在埃特鲁里亚，留守故居的沦为乞丐，逃入森林的沦为盗贼。最后，平民党首领有些因复古而丧生，又有些受尽亡命外国的苦痛，流浪于毛里塔尼亚海岸，或寄居于米特拉达特斯的宫廷和军中，他们全部的亲属和脱籍人都骚然不安；因为坚固的家族团结主宰当时的政治见解，按家族的团结来说，留在国内的人要顾全体面，^①就须设法使出亡在外的亲属有复回本国之权，至于死者，至少须设法使那沾在他们遗念和子孙上的污点得以洗去，祖遗的产业得以归还。尤其是罪人本身的儿女已被摄政夷为法律上的贱民，他们不啻由法律方面接到挑战书，请他们起而反抗现行秩序。

除以上各部的反对党外，又加以全体的破产之徒。这是一切沉湎于不论雅俗的淫乐而至倾家荡产的流氓，不分贵贱。有豪族

① 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一位新自由民名斯达伯·埃罗（Staberius Eros），是个有名的文学教师，他许罪人的儿童免费上课。

贵人，他们除债务外无以见其高贵；有苏拉的兵士，摄政的法令固然能化他们为地主，却不能化他们为农人，他们既挥霍了罪人的第一批遗产，还渴望再得第二批——这一切人只在等候那请他们反抗现行秩序的旗帜展开，至于旗上还写着什么，他们却不过问。由于同样的必要，一切求上进和务得民心的才智之士都依附反对党；不但严加封闭的贵族界所不许入内或至少不许有迅速升迁机会的人士，想冲入那座营阵，凭借人民的欢心，打破少数独占和注重资历的法律，而且有更为可畏的人，他们野心勃勃，志向很高，不屑在同僚制的阴谋诡计中决定世界的命运。合法反抗的场所未被苏拉封闭的只有律师的讲台，尤其在这讲台上，甚至当摄政尚存之时，这种想上进的人就用正式法学和灵巧演说术为武器，对复古激烈攻击，例如阿尔皮诺地主之子、生于 648 年即前 106 年 1 月 1 日的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长于演说，他以那既小心而又大胆的反抗独裁，骤然成名。如果敌人所愿望的不过是用这手段自取法座，然后志得意满，终身坐在那里，这种努力便不甚重要。当然，如果这把交椅不能满足一个得民心的人，如果盖乌斯·格拉古有了后继，一个生死攸关的斗争便不可免；但至少在当时，还没有一个这样高尚其志的人名可举。

苏拉的死或早于他自己所预料，他死之后，他所设立的寡头政府便不得不倚赖自己的能力。以上所说的就是这政府所须抵抗的反对党。这个工作本已不易，又有当时社会和政治上的恶劣状况使之难上加难——特别是一方面要使各省的军事首领服从最高民政当局的号令，一方面要应付那聚居首都的意大利籍和外国籍的人民大众，又要应付那在首都大抵实际自由过活的奴隶，而又没有可支配的军队，实是非常困难的事。元老院仿佛立在一个毫无屏蔽、面面受敌的堡垒中，严重的战事又在所不免。可是苏拉所缔造的抵抗力却也强大耐久，虽则全国大多数人公然不喜苏拉所立的

政府，甚至对它怀抱敌意，但对那迷乱纷纭，没有一致的目标和手段，缺乏领袖，而又分为几百个派别的反对党大众，这政府却很可以在堡垒中长久自保其地位，不过所必需的是元老院立下自保地位的决心，至少拿出一点建造堡垒的精力来守卫它；如果守兵不肯自卫，最伟大的设防家营造城池，也是枉然。

严格说来，双方都缺乏领袖，一切愈视双方领袖的人格为转移，这事便愈为不幸。此时期的政治完全为最恶劣的朋党制度所左右。这固然并不新鲜；各家和各社团的互相结合，本是与贵族政体不可分离的，数百年来即已风行于罗马。但到了本期，这些结合始强大无匹，也只是到了现在（始于 690 年即前 64 年）朋党结合的势力始不因法律禁令而敛迹，却因这种禁令而更有凭有据。一切贵族，无论倾向平民党的还是真正寡头党的，都结成帮会；公民大众，只要是常常参加政事的，也按他们的选区结成几如军队组织的坚固团体，以区长即区分配官（*divisores tribuum*）为他们的天然首领和代表。这些俱乐部买卖一切，特别是选民的表决权；此外元老和法官的表决权，造成街市暴动的打手和指挥暴动的头目也都在买卖之列。上流阶级的团体与下流阶级的团体，其分别只在价目表不同而已。帮会决定选举，帮会商妥弹劾，帮会领导辩护，它聘请有名望的律师；遇有必要，它为取得释放和免罪，与大规模买卖法官表决权而获厚利的商人订立合同。帮会以其团结的群众控制首都的街市，又不幸常因控制首都而主宰全国。这一切都按照某种规则办理，可以说是公开办理。帮会制度的组织和管理优于任何部门的国政；虽则在文明骗子中间常有不可直言这些罪过的默契，可是无人加以隐讳，有名的律师公然指明他们与顾客的帮会有关系，不以为耻。如果偶有一个人不做这事而仍参加公众生活，这人，有如马尔库斯·加图，必是个政界的堂·吉珂德先生。社团及其彼此争雄代替了政党和党争，阴谋诡计代替了政治。有一个

态度极为暧昧的人，名为普布利乌斯·克塞古斯(Publius Cethegus)，昔为最激烈的马略党，以后投归苏拉，受他优容，在本期的政治活动中居最有势力的地位——他狡猾绝伦，构煽和调停于元老院各派之间，他以政客身份，熟悉各奸党的秘密，有时最重要将帅的任命决定于他情人普雷琪娅(Praecia)的一句话。只在参加政治的人无一超过庸才之时始能有这种惨祸；任何才干超群的人必能如扫蛛网似的扫荡这种朋党；但此时极感缺乏的正是有政治或军事才能的人。

说到老辈，经内战以后，有名的人除年高多智而又善辞令的663年即前91年执政官卢奇乌斯·腓力普斯外，无一存在；他昔日曾倾向平民党，以后领导资本阶级以抗元老院，与马略党密切联络，最后又及时投到得胜的寡头党，博得感谢和酬报，在两党之间逃得性命。说到下一代，纯粹贵族最有名的领袖，有674年即前80年执政官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他与苏拉同犯危难，共享胜利；有苏拉死年——676年即前78年的执政官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 Lutatius Catulus)，系维尔凯莱战胜将军之子；有两位少年军官即卢奇乌斯·卢库卢斯和马尔库斯·卢库卢斯(Lucius und Marcus Lucullus)昆仲，前者在亚细亚，后者在意大利，都曾隶属苏拉部下，立有战功；至于贵族如昆图斯·霍滕西乌斯(640—704年即前114—前150年)仅因其为辩护士而关重要，以及677年即前77年的两位执政官德奇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和马莫库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李维亚努斯(Mamercus Aemilius Lepidus Livianus)等无能之辈。其最大优点在具有贵族式的铿锵姓名的，姑置不论。但甚至那四个人也不高于当时平庸的贵族。卡图卢斯一如其父，也是个高雅的人、正直的贵族，但才干有限，尤其不善用兵。梅特路斯不但人品可敬，而且是个有才略、有经验的军人；675年即前79年，他卸去执政官职

之后，卢西塔尼亚人和昆图斯·塞尔托里乌斯所率的罗马亡命徒又在西班牙起事。他所以被派往该地，并非因为他与摄政有密切的关系，为摄政的姻亲和同僚，而是因为他的才能为人所公认。卢库卢斯昆仲也是良将，尤其那位长兄，有很可敬的军事才能又有渊深的文学修养和写作的嗜好，并且他的为人也显然光明正大。不过说到从事政治，就是这几个出色的贵族，其疏忽短见也不亚于当时的一般元老。固然对于外面的敌人，其中最知名的有以自见其可用和骁勇；但他们没有一个显出愿望和技巧来解决真正的政治问题，没有一个能充道地的舵手引导如舟的国家走过那阴谋和党派的汹涌大海。他们的政治智慧仅限于真心相信寡头政治为救世的不二法门，痛恨奸雄作风和每种自谋解放的个人专权，并加以激烈的攻击。他们那卑鄙的野心好以琐事为满足。梅特路斯在西班牙时，据说他不但喜欢西班牙应景诗人那种不调和的琴瑟，而且他每到一处，竟至使人用敬神的奠酒和烧香来接待他，在筵宴时，使胜利神在假造的雷霆中下凡，以战胜者的金冠加在他头上；这事的无稽与大多数的历史逸事相等，但这种闲谈却映出堕落民族那种下流的野心。甚至较为出色的人士，尚未得到权势，只得到执政职、凯旋和元老院的一个尊位，便以为满意；他们只要有正当志向，刚开始对本国和本党真正有用之时，便退出政治舞台，沉湎于王者的奢侈生涯。像梅特路斯和卢奇乌斯·卢库卢斯一流人，就在做将军时，他们所想的也不是征服新君长和新民族以扩大罗马的领域，而是获得非洲和小亚细亚的新美味以扩充罗马烹饪术中野味、家禽和糖果的无穷项目，并且他们把一生的大半虚掷在多少有点聪明的游惰。祖传的长处和个人的克己是一切寡头政治的基础，在本期那没落而赖人工复原的罗马贵族中，这长处和克己业已荡然无存；据他们普遍的见解，帮会精神就是爱国心，好虚荣就是有大志，固陋就是始终如一。如果保管苏拉宪法的人是出席罗马红衣主教团或威

尼斯十人会议的人士，反对党是否能那么快地动摇他的宪法，我们不知；守护者既然是这等人，每次攻击当然造成严重的危机。

有些人对于苏拉宪法既不绝对服从，也不公然反抗，其中为大众所注目的无过于年少的格涅乌斯·庞培，苏拉死时他才二十八岁（生于688年即前106年9月29日）。此事对于景仰者和被景仰者均属不幸，但是自然之理。他有健全的身体和精神，是个绝好的运动家，甚至做高级军官时也与部下士兵比赛跳跃、竞走和举重；善于骑马和击剑，为义勇队的猛将，这位少年在绝不能任官职和入元老院的年龄，便已成为最高统帅和凯旋将军，并且在民意中已博得仅次于苏拉的地位；这还不算，宽容的摄政又半带承认半带讥讽地给他“大帝”这个别号。不幸他的天资与这些空前的成功迥不相侔。他不是个恶人，也不是个无能之辈，而是个十足平庸的人，天生是个好中士，现在应时势的要求，竟成为将军和政治家。他是个绝好的武人，有见解，有胆气，又有经验，可是甚至以军人资格而言，他也没有丝毫更高的天才。他做将军和其他事时，他的特色是谨慎从事，濒于畏怯，如果可能，仅在对敌人立下无限的优势时，始断然一击。他的修养是当时的普通修养；虽则纯是武人，他到罗德斯岛时，却不忘本分，向当地修辞家致其赞赏和馈赠。他的正直是一个有祖遗和自置的巨产而慎加管理的富人的正直。他耻于不按元老的常规来赚钱，但他太冷淡太殷实，不肯因为这事冒特别的危险，或自取明显的耻辱。他以正直无私著名，并且比较说来，确是很有根据，这不是因为他自有美德，而是因为他同时人恶习盛行。他的“诚实面貌”几乎有口皆碑，甚至到他死后，也仍被目为有德的高人；他确是个好邻人，不染当时贵族的恶习，如强迫卑贱的邻人出卖田产，或用更坏的手段扩充地界；在家庭生活中，他对妻室儿女感情甚笃。再者，他更有可敬之处，他首先废弃那先在凯旋中陈列掳来的敌君敌将而后置之死地的野蛮风习。但这不妨

碍他做下面的事：他的爱妻出自国贼之家，他奉主公苏拉的命令与她分离，又听这位主公的指示，很沉静地命人把一些曾在患难中扶助他的人杀死在眼前；人们虽然责备他残忍，他却不残忍，但或更恶于此，他冷酷，无论为善为恶，一概无情。在戎马仓皇中，他直视敌人，毫不畏缩；在公民生活中，他为人羞怯，常为些微小事两颊发赤，他当众发言时，不免忸怩不安，在交际上总是板滞、僵硬和拙笨。他尽管桀骜刚愎，却正如一般自炫其特立独行的人，在晓得运用他的人手里，是个柔顺的工具，尤其在那些他不怕受他们支配的脱籍奴隶和门客手里，他更是个柔顺的工具。他最不相宜的莫过于做政治家。没有确定的目标，没有选择手段的才能，无论对小事大事都是眼光短浅，束手无策，他常以肃然静默掩饰他的犹豫不决，他想弄玄虚之时，只是自以为欺人而反自欺罢了。由于他的军事地位和地方联络，他几乎无所作为便得到大群的私党依附他，他可以用他们做极大的事业；但庞培在一切方面不能领导和团结一个党派，如果这党仍团结不解，这也不是他的作为，而纯是时势使然。在这事一如在他事上，他使我们想起马略；但马略虽性情粗鲁暴躁，却还不如这位极可厌极呆板的假伟人。他的政治立场完全错误。他是苏拉一个部将，义应尊重复古的宪法，他却又不但反对元老院专政，而且反对苏拉个人。庞培一族仅在最近六十年来始入执政官名录，在贵族眼里尚未得到充分的资格；对于元老院，这位庞培的父亲曾抱很可恨的模棱态度。他自己也曾属于秦纳党——这些旧事或许无人提起，可是尚未遗忘。庞培在苏拉部下所得的高位，使他表面与贵族联络，心中却与他们不和。庞培既头脑简单，又那么迅速而容易地侥幸上攀荣华的绝顶，不免感觉眩晕。仿佛他要与最富诗意的英雄角色媲美，以嘲笑他自己干燥无诗意的性格，他始自比亚历山大大帝，自命为世界无双的人，不当仅为罗马五百元老之一。其实没有比庞培更适于参加贵族政治

的。他那庄严的外貌，他那肃穆的礼文，他那血气之勇，他那循规蹈矩的私生活，他那毫无创造力，如果他生在二百年前，或许能使他得个尊荣地位，与昆图斯·马可西姆斯和普布利乌斯·德奇姆斯并驾齐驱；凡庸为真贵人和真罗马人的特色，庞培与公民大众和元老院所以始终特别心投意合，得凡庸之助不少。他自始就是命定的元老院将军，如果他以此为足，甚至在他那时代，也可以占个鲜明而重要的位置。他却不以此为足，于是他陷入一种不幸的境况，要为其所不能为。他无日不求占国家中一个特殊地位；一旦地位到来，他又不能断然取为己有；众人和法律若不绝对屈从他，他便深感愤怒，可是他的态度却处处目众人为他的同列，不只是假作谦虚，并且只要一想做任何违背宪法的事，他便心惊肉跳。如是，既常与寡头党根本不睦，同时又是听命于寡头党的奴仆；既怀着野心而又常怕把它实现，他便在内心的永久矛盾中，毫无乐趣地度过他那纷纭缭乱的生活。

马尔库斯·克拉苏与庞培相似，也不能算作寡头党的绝对同党。他是个很能代表本期特色的人物。他比庞培大几岁，与之相似，也属于罗马的高等贵族界，也受过本阶级寻常的教育，也像庞培似的曾隶属苏拉部下，功劳卓著于意大利内战。在天资、文才和将略上他远不及许多侪辈，可是由于无限的活动，由于坚持到底、力求掌握一切和左右一切，他却赶过他们。最重要的是他投身于商业。他在革命期间收买地产，造成他那财富的基础；他不以任何牟利之事为耻；他经营首都的建筑业，规模既大，又很谨慎；他与他的新自由人合营极不相同的事业；他在罗马城内外开设银行，或亲自料理，或委人代办；他贷款于元老院的同事，并且偶尔替他们办事和贿赂法院。他在牟利上绝不选择手段。苏拉惩治罪人时，证明他有捏造名单之罪，因此苏拉在国事上不再用他；一纸遗嘱列有他的姓名，但显然出自伪造，他却不因此而拒受遗产；一个小农人

有田地与他的田地毗连，被他的管家用强力或诈骗逐出，他也不反对。再者，他避免公然犯法，他过着简单朴素的富人生活。这样，几年之间，克拉苏由一个有普通元老财产的人变为大富翁，他死前不久，支付了绝大的额外开销以后，他的财产仍达一亿七千万塞斯特。他成为罗马人的首富，所以同时也是政治上一个大人物。如果按照他的话，不能以自己的收入养一军的，不可自称为富，那么，谁能这样做，便不只是个公民。实际说来，克拉苏所着眼的目标不止于保持罗马最满的钱柜。他尽力扩充他的联络，不嫌劳苦。首都每一公民，他都能呼其姓名与他寒暄。人有求他在法庭上相助的，无一遭到拒绝。固然苍天没有多给他演说才能，他的演辞枯燥无味，他的发言太嫌单调，他患重听；但他那坚持到底的精神不为厌倦所阻遏，不为快乐所转移，竟能打破这些障碍。他从不显得事前无备，他从不临阵磨枪，所以他成为时刻受人请求和时刻有准备的辩护律师；说起来不是诽谤他：在他手里，很难有太恶劣的讼案，他不但晓得用他的演说感动法官，而且晓得用他的联络，如有必要，用他的金钱，运动法官。元老院有一半人欠他的债，他惯于借钱给朋友，不取利息，随意收回，使一些有势力的人依赖他，并且他不分党派，与一切方面维持关系，欣然借给任何能付钱的或其他有用的人。最激烈的党魁向各方面施行攻击，无所忌惮，却慎避与克拉苏寻衅；人们拿他比作一群牛的公牛，人绝不宜触犯他。不言而喻，这样的人处在这样的地位，其志必不在小；克拉苏异于庞培，他确知政治投机的目的和手段，有如一个银行家。自罗马肇始以来，资本在这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时代既然如此，金或铁似乎能打通一切。在革命时期，富豪阶级或许想到推翻氏族寡头党，果若是，像克拉苏这样人所注目的或许超过凯旋将军的束棒和绣衣。目下他是个苏拉党，是个拥护元老院的人，不过他偏是个财政家，不能专属于某一党派，也不能追求个人利益以外的任何事物。克拉苏

既是罗马最有钱、最善阴谋的人，又不是个守财奴，而是个规模极大的投机家，要拿王冠来投机有何不可？或许他单独一人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但他已与人合伙做了许多大事；关于此事，也未尝不能有个相当的人出来与他合作。这是当时的特色：一个平凡的演说家和军人，一个以好动为有能力、以贪利为有志向的政客，一个根本上只有绝大财产和拉拢关系的商贾才能的人——这样的人仗着万能的会党和阴谋，竟能自以为与当日第一流将军和政治家不相上下，并且竟能与他们竞争那引起政治野心的最高利物。

在真正反对党里，无论开明的保守党或平民党，革命风波已造成可怕的损害。在开明的保守党里，仅存的名人是盖乌斯科塔(630—681年即前124—前73年)，他是德鲁苏斯的朋友和同志，因而在663年即前91年被逐出国，然后在苏拉得胜时奉召回国。他是个聪明人，又是个胜任的辩护士，但无论他本党的重要性或他个人的重要性都只能使他居可敬的次要地位。在平民党后起的少年中，有个二十四岁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æsar, 生于652年即前102年7月12日^①)，引起

① 人常以654年即前100年为恺撒降生之年，因为据苏埃托尼乌斯、普鲁塔克和阿庇安之说，他死时(710年即前44年3月15日)年五十六岁；人云苏拉攫夺人权时(672年即前82年)，他年十八岁，也与上说大致相合。但这种见解与下列事实绝对不合：恺撒在689年即前65年充市政官职，在692年即前62年充副执政官职，在695年即前59年充执政官职，而按年龄法，任这些职位最早的年龄，依次序说，为三十七至三十八岁，四十至四十一岁，四十三至四十四岁。我们不能想象为什么恺撒在法定年龄两年之前就充任这一切法座职，更不能想象为什么这事不见于任何记载。这些事实毋宁引起一种猜度，就是他的生日即在7月12日，毫无可疑，那么，他生于652年即前102年而非生于654年即前100年，这样，在672年即前102年，他正是二十至二十一岁；并且他死时不是五十六岁而是五十七岁零八个月。再者，我们可以举出事实为后说的佐证——说来奇怪，这种事实竟被引来做反证——恺撒差不多还是个童子(*poene puer*)，便受马略和秦纳的任命，做朱庇特的点火僧；马略死于668年即前86年1月，按寻常的见解，恺撒那时不过十三岁零六个月，所以非如维莱乌斯(Velleius)所谓“差不多”，而确乎仍是个童子，大概就因为这个原故，绝不能充这种祭司职。反之，如果他